

· 国际政治 ·

##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 吴白乙

**内容提要** 本文再度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历史基础和主要现实问题是基于对近来中外相关观点的反思, 承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基础地位, 并强调 60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特殊政治意识对于前者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对自身兴盛的承认和接纳仍具独到的作用。与此同时, 本文还分析了这一关系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全球力量的转移和国际事务更趋复杂而面临的主要矛盾或失衡性挑战, 提出基于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现实所制定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战略, 不仅应该继续包含重要的地缘政治考虑, 更有必要增加解决全球范围功能性议题的思想和原则。最后, 本文就如何改进这一新战略的具体支撑点进行初步评估和思考。

**关键词** 国际政治 发展中国家 中国外交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面, 历届中国领导人对此都曾多次确认<sup>1</sup>, 其根本原因在于迄今为止中国始终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大国”属性, 故而这一关系有别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具有鲜明的“政治平等、共同发展和南南合作”的性质。这一战略选择无疑是符合事实的, 因此也是可以持续的。本文之所以提出对这一关系进行“再思考”, 自然不是质疑这一战略定位, 而主要是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客观变动, 以及为中国外交服务和推进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内实现和平复兴伟大使命的主观要求,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及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刍议, 意在引起更多的讨论。

### 一 对历史的再确认

毫无疑问, 所谓“关系”是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状态。国际关系自然就是指不同的国际行为体通过各自的政策实践发生互动的过程与结果。由此显见, “关系”, 特别是国际政治, 是一种变动的事物现象, 既是对客观条件、环境范围、偶然因素等的反射, 也含有鲜明的主观愿望和精神追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 中国与发展中

国家政治关系历久弥坚, 形成了深厚的历史根源。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对相互政策的理解、对彼此境遇的同情。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经过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斗争获得了新生, 也给广大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及其政治领袖、社会精英带来了实际的鼓舞。据不完全统计, 1950~1959 年期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许多国家的各界知名人士和政党领导人约 1 200 人访问了新中国<sup>2</sup>。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深受其在华见历的感染, 热情地赞扬新中国“张开强有力的手臂, 拥抱着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你呵, 中国: ‘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sup>3</sup>。尽管中国与多米尼加迄今仍未建交, 但两国人民的友谊却历久弥坚。最近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米尼加科学院院长内尔森·莫雷诺·塞巴约斯教授 (Nelson Moreno - Ceballos) 表示, 早在 1965 年多米尼加进行反对美国武力干涉的斗争时,

<sup>1</sup> 2004 年胡锦涛主席再次重申, 中国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信赖的朋友, 巩固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见《胡锦涛在阿尔及利亚总统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强调 进一步推进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 载《人民日报》2004 年 2 月 5 日, 第 1 版。

<sup>2</sup> 沙丁等著:《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第 279 页。

<sup>3</sup> 聂鲁达著, 邹绛等译:《聂鲁达诗选》,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第 175~176 页。

收稿日期: 2010-07-10

作者简介: 吴白乙,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毛泽东主席就曾声援多米尼加人民的正义斗争，成为当时除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外唯一一位公开向多米尼加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对此多米尼加人民一直心存感激。塞巴约斯教授曾长期研究毛泽东思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撰写过《论毛泽东的治学之道》一文<sup>1</sup>。

外交上的相互承认和道义支持是国际政治关系的最高形式。新中国诞生后，美国等西方敌对力量长期奉行孤立和遏制政策，许多国际社会成员对于代表中国人民的新生政权尚不了解，难免抱有疑虑或歧见。在当时，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是保证新中国基本的制度安全的主要途径，也直接考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力量能否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站住脚”的基本执政能力<sup>2</sup>。然而，这一时期亚非地区许多民族仍然处于脱离殖民统治的前夕，即使南半球的一些国家取得了独立，却难以彻底摆脱北半球西方大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迫。“美国垄断组织控制了拉丁美洲几乎全部的铁矿、铝土矿的开采，将近90%的铜矿开采，70%的白银开采，将近60%的锌的生产，50%以上的石油、锰矿和白金的开采，以及硝石和锡的大部分开采。此外，美国垄断资本还控制许多国家重要出口农作物的生产。”<sup>3</sup>因此，在1955年之前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25个国家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居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则仅限于少数几个独立不久的亚洲国家<sup>4</sup>。

从1955年到1964年，随着亚非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独立，中国与之建交的数量增加到26国，特别是1960年之后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拉丁美洲也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sup>5</sup>。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毛泽东就公开表示“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中国政府则率先承认了古巴革命政府。除了政治与道义支持外，中国还于当年与古巴签订了总额为13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给予古巴以有效的物质援助。次年，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上，卡斯特罗和上百万群众一致通过了包括与中国建交等内容的《哈瓦那宣言》。不久，古巴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拉美国家<sup>6</sup>。20世纪70年代也是部分前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共有亚洲11国、非洲8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6国、大洋洲6国独立，至此，战后新独立国家已达90个（占全部独立国家161国的一半以上），全球除一些小岛外，“各大洲大陆上已无大片的殖民地”<sup>7</sup>。中国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交高潮也在这一时期完成。

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双边外交关系为后来中国摆脱孤立于国际多边体系之外的境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在二战结束后的近20年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一度“被认为是过于贫穷，过于欠发展，过于弱小，或者过于不稳定”，受到大国和强国话语霸权的欺压，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sup>8</sup>。毛泽东则认为，天下大事，特别是争取和平，避免世界大战，光靠大国协商是不行的，“要两条腿走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重要的腿，是第一条腿<sup>9</sup>。因此，新中国外交的重心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也曾为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营造多边外交“小气候”进行过长期的艰苦开拓，尝试通过文化、新闻、体育、青年等人民外交形式建立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多边“二轨”机制<sup>10</sup>。事实证明，中国领导人选择以弱国、小国为依托的多边外交战略是

<sup>1</sup> 袁琳：《李慎明副院长会见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内尔森·莫雷诺·塞巴约斯》，载《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0年6月28日。<http://ilas.cass.cn/cn/kwzx/content.asp?infid=13484>

<sup>2</sup>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35页。

<sup>3</sup>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1页。

<sup>4</sup> 印度不仅较早承认新中国，并且自上世纪50年代初始终不渝地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次提案。

<sup>5</sup>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64—165页。

<sup>6</sup> 徐世澄著：《卡斯特罗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1—353页。

<sup>7</sup>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52页。

<sup>8</sup> [美]霍华德·威尔逊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序言。

<sup>9</sup>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sup>10</sup> 除了众所周知的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等外，中国还曾与印尼等国一道竭力推动在非洲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尽管这次会议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举行。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3页；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71—484页；张民军：《美国的遏制政策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网》2008年3月，<http://www.cokwarchina.org/mgyj/mgydss/j002371.html>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亚非作家协会、亚非记者协会、新兴力量运动会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早期合作机制的筹备工作以及其后的组织运转活动。

极富远见的，而骄横狂妄的美国领导人却直到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之后才意识到其主宰世界和打压异己的时代已经结束，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整体上升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sup>1</sup>。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蒋介石政权的2758号决议，击败了美、日代表提出的涉华“双重代表权”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终于作为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重返联合国组织。这一胜利既出乎美国人的预料，也超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预期，毛泽东高兴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sup>2</sup>，并指示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要算账”，对多年来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美、日等国家要点名批判，而“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一一列举”，对“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4个国家也要团结”<sup>3</sup>。

“患难之交”不仅体现在中国重返国际组织之前，也一直延续到此后中国历次陷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出现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1989年6月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反华高潮，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正在他国访问途中的钱其琛外长被迫取消了预定的访美日程，而刚与中国恢复政治关系不久的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热情接待了中国外长，并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内团结的决策，愿意为钱外长提供发表任何声明的场所和条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04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声援下，涉华人权提案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被挫败。钱其琛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历程，不能不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在经济上弥补西方对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在政治上，他们却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些亚、非、拉各国的领导人或外长，对中国的热情友好一如既往……这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尤为难能可贵。”<sup>4</sup> 尽管2008年春北京奥组委组织了主题为“环球和谐之旅”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行程覆盖全球5大洲21个国家，总里程约13.7万千米，然而这一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友善接力之举却再一次成为中外关系的试金石。它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到热烈、安全的接待，而“不和谐”的杂音甚至严

重的干扰破坏行为则全部来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sup>5</sup>。

概括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基础主要体现在其广泛的政治包容性。中外双方在建立这一关系之初就平行地站在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起点上，它们克服地缘、种族、文化、社会制度的差距，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发展方向，在本质上游离于雅尔塔国际体系之外，具有强烈的摆脱霸权力量支配与控制的取向，从而代表了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sup>6</sup>。与此同时，这一关系也为奠定新中国对外关系格局、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一政治支持同样也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构成其外部安全的基本面，为中国应对来自西方的非难和压力提供了有力的依托。对此，无论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都是不应遗忘而必须予以承继的。

## 二 对现实问题的再辨析

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长期以来已形成世所公认的传统优势<sup>7</sup>。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得到空前发展，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空间更加开阔，内在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各自现实利益的变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更加丰富和复杂，进入了对互利共赢新模式的探索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双方介入和推导这一关系的行为体也在增加，导致关系外延的多元

<sup>1</sup> 197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对抗的时期过去了，我们正进入谈判的时代”，并首次提出这一时代将出现美、欧、苏、中、日五大世界力量中心的预测。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52页。

<sup>2</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27页，第1634页。

<sup>3</sup>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66—369页。

<sup>4</sup>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6—169页，第198—199页。

<sup>5</sup> 黄晴：《奥运圣火，人心所向》，载《人民日报》2008年4月21日；贺文萍：《从中非关系看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战略》，载《亚非纵横》，2008年第3期，第30页。

<sup>6</sup> 黄仁伟著：《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sup>7</sup> Joshua Eiseeman, Eric Heginbotham,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7, pp. 13—19

化现象日益突出，也直接带来关系结构新的分层。与此同时，外界对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的质疑和非议也相伴而生。一些西方大国一方面出于各种目的对中国冠以“新殖民主义”恶名，诋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国与亚非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关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要求中国对那些被西方戴上“非民主”“虚弱”“失败”甚至是“流氓”标签的政府采取和它们一样的“惩戒”和“治理”措施<sup>1</sup>。此外，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还存在着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倾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群体性共同特征正在退化，已经由“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由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体系，从坚定主张南南合作变为更加依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搭便车”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全面分化的态势似成定局<sup>2</sup>。上述种种因素，无疑对保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政治关系增加了困惑和难度。

笔者认为，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中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判断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政治合作是否可以持续的关键。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加以考察。

（一）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意愿与全球权力格局之间的失衡。冷战结束以后，尽管标志着旧的国际政治分野的东西方对立消失了，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是在加剧。除了经济（特别是市场份额、人才和技术资源）优势的分布依然存在“北重南轻”的格局外，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国际事务决策权力的分配严重不适应全球人口、自然资源、发展援助的实际状况和需求，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崛起，已经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sup>3</sup>。2008年以来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正是这一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也使得调整国际体系，特别是现存国际组织机构内部权力分配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新的焦点<sup>4</sup>。

笔者认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仍然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第一，前述观点所提及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战术变化并不一定代表其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也难以在实践中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世界的基本关系格局，更不足以改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抵御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境遇仍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长期事业，而力求在国际制度顶层逐渐获取更多的决策权、话语权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利益公约数。

第二，尽管受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一部分南方国家出现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向北方国家靠拢的动向，但是民族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仍将是为人类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护的基本政治单位。作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民族主义还将是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与公民权益的基本政治哲学。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西方所竭力推行的超国家政治和“人权高于主权”等价值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难以吻合，也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最终难以在政治“西化”道路上走到底的根本障碍<sup>5</sup>。

第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交往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和争议并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更不具有绝对的对抗性质，双方终究可以凭借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互谅互让地加以解决。此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政治体制、宗教和种族成见的严重冲突。相反，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发展中的内外挑战为双方维护政治互信提供了持续动力。

第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近年来发展取得的综合实力和经验，既可以在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也可以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实质性国际权利，使其国际政治、经

<sup>1</sup> [德] 白小川：《欧盟对中国非洲政策的回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4期，第72~74页。

<sup>2</sup> 董漫远：《发展中国家大分化的战略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5期，第9页，第12页。

<sup>3</sup> 以2010年4月世界银行与IMF春季联合会议为例，世界银行已通过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投票权的改革方案，IMF也表示将加快自身改革，特别是落实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配额及话语权，并在2011年1月前完成对新的配额改革计划的评估。然而，在全球经济前景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人们不免担忧欧美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分歧和矛盾有可能加剧，已通过的IMF改革方案将难以落实。《加强协调合作将成主流，IMF和世行改革仍需努力》，载《我的钢铁网》2010年6月25日。[http://www.mysteel.com/gc/zhxx/gjw/2010/06/25/095000\\_2304945.html](http://www.mysteel.com/gc/zhxx/gjw/2010/06/25/095000_2304945.html)

<sup>4</sup> 曹泳鑫：《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国家、地区、全球秩序的三重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27页；房宁：《权力集中为后发国家提供体制路径》，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3/4期合刊，第120~125页。

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改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在本世纪内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不仅需要中国人民自身的团结奋斗,还需要更好地解决为外界所接纳甚至协同(而非抵制)这一重要前提。显然,能否获得占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承认和理解,同样将决定中国可否彻底摆脱大国兴衰的历史窠臼,实现“天下主义”的崇高抱负。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道路”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外经和外宣工作的不断改进,发展中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正在加深,尽管这还远远不够。

(二)发展中国家亟需凝聚力量与中国兼顾与发达国家关系现实需要的矛盾。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基于两个方向的战略调整无疑获得了巨大成功。一是放弃了针对主要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自身的发展和建设由此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资源空间;二是及时改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观认识,扭转了过于强调其整体利益,忽视其内部差异的政策偏向,增加了处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甚至冲突的政策灵活度<sup>1</sup>。如今当人们再次对此进行回顾,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在获得巨大的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具有代表性地同发达经济体之间产生了相当高的利益共生关系,从而一方面使中国不能不顾及与发达国家间外交上的基本稳定,甚至还要时常为应对来自后者的压力而被动周旋,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空间<sup>2</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外力量对比的变化,发达国家反而更加注意利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周边地区存在的某些历史遗留未决的矛盾加大对中国“韬光养晦”外交实践的干扰。例如,中国与相关邻国在南海主权及划界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与东盟及有关国家的多边和双边框架,中外各方已就“搁置争议、合作开发”,共同维护该地区稳定达成重要共识。然而,2010年3月,美国海军“无瑕”号监测船公然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美国官方事后更将这一海区称为“国际海域”,从而首次正式加入在该问题上的主权争议。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在中国领海主权这一核心利益上采取“搅混水”的做法,使南海问题的国际争议更加复杂化。为了降低其“多米诺”效应,中国不得不更加重视保护自

己的海洋权益,“想低调(处理这一矛盾)也不可能了”<sup>3</sup>。

事实表明,兼顾与发达国家关系,与之协作处理和解决与中国利益关联较大的地区稳定问题,自然有利于提高国际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但这样做还必须时刻照顾到中国外交的长远发展格局,而不能为短期的利益而损伤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战略部署。中国毕竟属于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的矛盾才是主要的、长期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纠纷是局部的、暂时的,这应该是权衡二者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未来20年是中国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机遇期,来自国际体系上层权势对中国兴起的排斥力可能会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加大,而中国外交要逆势而上,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为此减压,其着眼点一是要用好国际多边机制这一舞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二是全力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确保中国国际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不断得到扩大和巩固。为此,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应该与时俱进地增加解决全球范围功能性议题的思想和原则,主动创新更具公平性、可行性的国际公共安全和福利产品。近期,中国可适时提出一项旨在团结最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策议程,其中包括进一步促进南南合作、增加发展中国家互助、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在改革国际组织等重大问题上实现协调一致等重要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中期,中国应根据“G20”、中国与东盟“10+1”对话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非论坛、中阿论坛、“金砖四国”等各类多边机制的实践经验,联合有关方面加大其中的发展中国家间政治协商功能;长期,通过获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持续的政治认同与合作,中

<sup>1</sup> 郭新宁、徐奔郁著:《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析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44页,第47~49页。

<sup>2</sup> 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始,“为取悦于美国和以色列”,中国曾数次取消与伊朗的核技术及军品贸易合同,还在联合国有关伊朗的决议案中一直避免使用否决权。See Joshua E isern an Eric Hegnbtham, Derek Mitchell ( eds ),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pe hc, 2007, p. 123. 2010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针对伊朗的第四轮制裁方案,中国投了赞成票。席来旺、吴云:《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厉制裁伊朗方案,中方赞成》,载《人民网》2010年6月10日。[http://news qq.com/a/20100610/000290.htm](http://news.qq.com/a/20100610/000290.htm)

<sup>3</sup> 米艾尼、张静:《分析称我国高调宣示南海主权显示外交思路变化》,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7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7-12/173220662004.shtml>

国可以进一步改进对外援助的功能、方式和效率,将发展的红利更多地“反哺”于发展中世界的合作事业,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梯次跟进,逐步形成世界政治进步和经济繁荣的主导力量。

(三) 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失稳与中国外交引导能力不足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不当头,不扛旗”的方针,改变了以往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抗和造反的过激政策,取得了“谁也不得罪”的基本实效,保证国内建设和政治稳定较少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干扰<sup>1</sup>。这条基本经验在中国国际化程度不高,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运行面在国内(包括吸引外资)的情况下是完全准确的,然而自2001年以来,中国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的指导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国门并参与国际生产资料循环、投资竞争和市场规则修订的广度和深度与以往已大不相同。换句话说,中国对外部综合安全的依赖更加明显,特别是对国际投资、贸易、运输条件及目的地国家的社会状况已尤为敏感。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因经济全球化而受益,国家分裂,经济贫困,也有一些国家部族、教派之间纠葛不断,冲突频发,还有的地区和国家深受各种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渗透,政局动荡,社会失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sup>2</sup>。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完全置身局外,对缓和与解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突出政治和安全问题不关心、不评判、不介入显然已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也不利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局。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至今,中国已逐步参与到国际斡旋活动之中,在印巴核试验、达尔富尔危机等涉及发展中国家间冲突和稳定国际机制等案例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多的多边协调和对话者的作用<sup>3</sup>。随着类似实践的增多,中国要“谁也不得罪”显然已难以做到,而只能借助于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地区机制和相关国家政府的主动请求来减少“干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藏身”于上述各种合法性资源之后,中国外交依然面临另一方面的困境:一是自身的引导力不足,难以突显中国的道义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独到理解,给人以“随大流”的平淡印象;二是被别有用心地“捧杀”,容易给外界造成中国与少数大国操控国际政治的错觉,增加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芥蒂;三是还有被人充作“冤大头”,为西方主导的冲突地区战后重建埋单之嫌<sup>4</sup>。相应于这些困窘,

中国外交主动斡旋或单独调解的实践仍然偏少,一方面是观念偏于保守,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到对当事国家历史、文化、部族、人员的知识和联系不足的局限,处理国际危机的体制机制、思维和语言习惯、应变技巧等还不能适应复杂的形势所需。

(四)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知差别与中国“公共外交”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新中国外交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操作面曾根据不同的对象出现过“政府对政府”(直接建交类)、“从政党+民间到官方”(未建交类)、“以经促政”(不具备建交条件类)等三种主要模式,其中后两者都曾为新中国开启与部分独立及尚未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交往,特别是为以后正式建立双边外交关系,乃至对遏制“台独”势力扩大“国际空间”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外交局面的扩大,近些年来与已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关系多偏重于官方往来(即使如此,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仍感应接不暇),甚至局限于当权派或上层人士,而针对其普通民众的外交工作则渐无特色和力度,适应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和援助发展新形势的宣传解释工作不够深入扎实和准确细致,有些在驻在国举办的活动流于表面形式,缺乏贴近感和亲和力,官方援助项目惠及当地百姓的程度还不高。总体来

<sup>1</sup>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页。

<sup>2</sup> 宫少朋:《有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几点思考》,载《亚非纵横》,2010年第2期,第44页。

<sup>3</sup>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77~78页;唐家璇著:《劲雨煦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姜宅九:《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21页。

<sup>4</sup> 例如,一些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战后重建的援助上“各有打算”,“口惠而实不至”,或者将其驻军军费充作援助的大部分资金,或者只承担投资较少、相对简单的工程。中国则不仅在战后重建之初就迅速向阿临时政府捐赠现金,还承担了重建帕尔旺水坝、坎大哈医院重建工程等具有全局影响力、可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较大工程。参见刘洪:《阿富汗重建荆棘载途》,载《四川日报》网2002年1月21日, <http://www.sichuandaily.com.cn/2002/01/21/83263068.htm> 新华社:《中国决定再为阿富汗提供1亿5000万美元援助》,载《新华网》2002年1月2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2-01-24/455597.htm> 韩洁、任芳:《中国今年将为阿富汗重建提供1500万美元无偿援助》,载《新华网》2004年4月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01/content\\_1396636.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01/content_1396636.htm); 人民日报:《中国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阿富汗》,载《人民网》2009年8月6日, [http://csh.qingdaonews.com/showAnnounce.php?topic\\_id=4424749&board\\_id=2](http://csh.qingdaonews.com/showAnnounce.php?topic_id=4424749&board_id=2) 新华社:《联合国驻阿富汗特别代表认为国际社会缺乏协作》,载《南国日报》2009年9月3日,第25版。

说,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具体实施能力尚待改进, 中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认知程度普遍偏低, 境外行为也颇受诟议, 文明素养亟需提高<sup>1</sup>。这些问题虽然存在程度不一, 有些只是个别和局部现象, 但是值得“亡羊补牢”, “未雨绸缪”。

首先, 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带来内部利益多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同时也由于这些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体制原因, 政府本身的政策、法律制度及人事更迭一般都较为频繁, 除了中国周边一些发展中邻国外, 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政策还不能确保“全天候”地稳定, 因而做好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友好工作, “多头多层下注”应该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策略的要义之一。

其次,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意识形态特征多为民族主义和强烈的主权观念, 中国外交要配合国家海外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 一方面引导驻外企业做好回馈当地社会的行动方案, 给普通百姓带去“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和平等参与就业的机会, 消弭当地狭隘民族主义煽动公众的隐患, 打牢中国外交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 要用有效的道理、事实和语言形式利用当地媒体, 讲清双方合作互补的“大道理”和惠及民生的“小算盘”, 使中国人民建设和谐共赢世界的美好感情与诚实品质得到更广泛的宣扬和认知。最重要的是, 中国外交应该继续坚持对小国、穷国特别尊重、特别优惠等已被历史证明是特别有效的光荣传统, 决不能因为自身发展了就忽略或轻视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尊及其有益的发展建设经验, 更不能不加区别地参与外部力量所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活动。

最后, 进一步改进外交人员使用和评价机制,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人才培养和资源投入力度。外交工作, 说到底主要是做人的工作。中国外交界已经涌现了一批善于主动开创驻在国公共关系新局面的使节, 他们一改往日“不苟言笑, 铁板一块”的对外形象, 以“亲民路线”“个性化外交”和“媒体公共”等策略更加贴近外国百姓的视角, 赢得好评如潮<sup>2</sup>。不过, 这一变化还不是普遍的,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外交的局面陈旧, 实效性不明显, 不少长期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外交人才晋升机会偏少, 也有一些干部不愿意到“穷、远、险”的地区和国家常驻。尽管目前外交部内干部跨司流动使用、跨地区选派的改革已经出现, 但还没有成为大气候, 干部业务发展方向固定化的

倾向有待改变。这些问题与干部体制、评价机制固然有关, 却也多少反映出某种观念倾向仍待纠正。只有中国外交队伍的来源更加丰富, 内部循环更加合理灵活, 才能更加适应复杂的全球政治体系, 也为更多人才的群体性成功创造广阔的空间”。

(五) 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研究与外交实际需求之间的不衔接、不对称。外交是国家精神追求和利益绑定的具体行为过程, 因而终究无法摆脱主观建构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 学术研究本应发挥应有的先行作用。但是, 在过去 6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力来自最高决策层, 学术界的独立研究和思考不足, “对官方的观点提供解释和论证”有余<sup>3</sup>。近年来, 这一状况已有了较大的改善, 无论在宏观决策还是在微观调整方面, 官方都更加强调尊重专业知识和咨询专业人才。学术人士受聘于外交部咨询委员会, 或直接参与外交外事的一线工作, 甚至主持中外政府间双边委员会专门小组工作等现象已不鲜见<sup>4</sup>。然而从总体上说, 中国学术界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较之国外同行而言尚嫌微弱,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相关政策的影响还十分有限。究其根本原因, 一是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中”阶段特征十分突出, 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主要完成了国际问题研究与一般学术规范的“接轨”, 其主要积淀为“引进来”的西方政治、外交理论, 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 适合中国外交的学术体系则刚刚起步<sup>5</sup>。二是从事国际问

<sup>1</sup> 王博:《向世界讲“中国故事”》载《世界知识》, 2010年第1期, 第21页;李慎明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页,第174页;《海外华人形象频遭非议》,载《环球时报》2009年9月8日,第7版。

<sup>2</sup> 董关鹏:《大使国家公共新时代》,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4期,第14页。

<sup>3</sup> 宫少朋:《有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几点思考》,载《亚非纵横》,2010年第2期,第46页;王逸舟:《中国外交十难题》,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第21页。

<sup>4</sup> 赵全胜:《知识分子和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载郝雨凡、林甦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sup>5</sup> 吴白乙:《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27页;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9页。

<sup>6</sup> 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第79~98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4页;万俊人:《思想界“中国意识”迅速增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31日,第4版。

题研究的专业人员总量不足,例如全国进行非洲研究的学者约有 300人(其中专门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约 100人),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学者(含退休人员)不超过 200人,且集中在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在国内主要国际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结构也呈现“哑铃”型,拥有正高级职称和初级职称甚至博士研究生为两个主要群体,而处于承上启下年龄段和职称段的作者则相对较少,2007年仅为 19%,存在这一队伍“断链”之虞<sup>1</sup>。三是学术研究“问题”意识发育不足,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受研究对象相对贫弱或偏远、双边交流能力有限、资料陈旧、社会需求不旺、资金匮乏等因素影响,研究视野狭窄,实际体验较少,研究成果总量小,针对性不强,影响力微薄。仍以 2007年为例,拉美研究仅占全国主要国际问题研究期刊论文总量的 2%<sup>2</sup>。为了有效地改变这一不容乐观的趋势,国家应该在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全面统筹、支持和储备的总原则下,“对于那些不是(外交)热点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要“造就一批能够掌握当地国家语言,并对当地国家的人文风格有切身体会、与精英和平民均有过切身交往的外交官,同时还必须造就一批对当地国家有过深入细致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在平时的价值是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则能够用他们的知识为国家和社会排忧解难”。国家还应该立法,通过税收减免,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国的跨国企业将一部分收益投入到地区研究上来”。此外,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应该考虑同时推进学术研究机构的去行政化,带动相关制度文化的改变,促使学术评价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乃至学风更具公平性、竞争性和自律性。最后,国家应通过人事、涉密等制度的改革,降低外交外事部门与学术界信息交流的门槛,加大学者与官员“旋转门”式双向聘用和流动的政策空间。

### 三 结语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看法开始多元化。一部分学者强调其重新定位的必要,认为“在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变中,发展中国家迅速变化和分化,与此同时中国也经过改革开放取得了现代化的巨大进展。在 21 世纪初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因应形式而进行调整,发展中

国家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也必须重新审视”<sup>3</sup>。一部分学者则坚持“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利益,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政治根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应与同发达国家关系协调发展,而不可被忽视或偏废<sup>4</sup>。在另外一部分学者看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已经不再以政治属性为主,而代之以经贸、能源为优先目标<sup>5</sup>。还有一些学者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国际战略丰富性与复杂性着眼,提出中国自身地位未定的观点。他们认为,毕竟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政治中任意选择政治归属,其国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其他国际社会成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和承认的。虽然中国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并始终自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精神上的同盟者,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sup>6</sup>。上述不同观点乃至争论实际反映了中国内外因素变动对这一关系带来的驱动和冲击,以及学者据此作出先验性思考过程中出现的困惑。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集中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历史基础和主要现实问题是基于对上述观点的反思,承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基础地位,并强调其 60 年来业已形成的特殊政治意识对中国进一步获得外部世界的承认和接纳仍具独到的作用。

(下转第 19 页)

<sup>1</sup>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67~68页。

<sup>2</sup>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0~11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73页。

<sup>3</sup>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3页。

<sup>4</sup> 俞新天:《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40页。

<sup>5</sup> 杨福昌、张清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及对中国政策的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页。

<sup>6</sup> Joshua Eisman, Eric Heginbotham,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7, p. x

<sup>7</sup>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难题》,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第23页;郑永年:《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联合早报》2010年6月1日,转自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hb/news/2010/06-01/2316685.shtml>



情况，向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作出报告。(7) 建立鼓励公民参与的制度机制，规定国家机构应把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作为一项责任，实施有利于公民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各级政府部门都应建立公民参与的计划，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 小 结

拉美国家政府与 NGOs 的关系经历了从疏远到接近、从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也越来越复杂，需要根据新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在不少拉美国家，引导 NGO 的发展、管理和规范 NGOs 活动成为政府的长期课题。各国陆续在完善立法、加强行政管理、强化资金支持和控制、完善实践引导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美国家政策的总体趋势是加强对 NGO 管理和指导，发挥 NGO 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其不良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各国国情差异很大，政策措施及其效果不完全一样。一些国家管理 NGO 的政策在国内外引起争议，甚至遭到 NGO 的反对和抵制。这表明政府与 NGOs 关系的调整是一

### (上接第 10 页)

本文还归纳并分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全球力量的转移和国际事务更趋复杂而面临的主要矛盾或失衡问题，提出基于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现实所制定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战略，不仅应该继续包含重要的地缘政治考虑，更有必要增加解决全球范围功能性议题的思想和原则。

最后，本文就如何改进这一新战略的具体支撑点进行初步评估和思考，尽管难免以偏概全之虞，却完全出自真实的忧思情怀，也是对扭转当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中“经济面”具体和张扬，而“政治面”空泛和低沉现象尽到一己些微之力。

### 主要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2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 3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 4 沙丁等著：《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主要参考文献

- 1 Anthony Bebbington and Others,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Routledge, 1993.
- 2 Global Philanthropy Foundation Building Home Knowledge Base - *Civil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 The Synergos Institute, 1997.
- 3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Con un tratado de ONGs sobre Ley 28925 (APCI)”, *Publicado en el Diario Per 21*, 19 de diciembre de 2006. <http://www.iep.org.pe/noticias>
- 4 Joe Foweraker, *Grassroots Movements Political Activ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Chile and Brazil*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gram,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1.
- 5 Ministerio Secretaría General de Gobierno “Proyecto de Ley sobre Asociaciones y Participación Ciudadana en la Gestión Pública”. <http://www.participemos.cl/index>
- 6 “Reglamento de la Ley de Fomento a las Actividades de Bienestar y Desarrollo Social”. <http://www.ordenjuridico.gob.mx/Estatal/.../Reglamentos/BCREGLA17.pdf>

(责任编辑 张颖)

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5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
- 6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 7 [美] 霍华德·威尔亚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8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7.
- 9 董漫远：《发展中国家大分化的战略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5 期。
- 10 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1 期。
- 1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3 期。
- 12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1 期。
- 13 俞新天：《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 刘维广)

## Abstracts

### Reconsiderations o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3– 10)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viewpoints, the article seek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rrent major issues of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recognizes that the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still playing a fundamental role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which ar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a result of sixty years' development and remain to be a key factor for China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major challenges to the relations which are emerged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power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 argues that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inject the ideas and principles of resolving global functional issues into its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is usually geo-politically oriented.

(Wu Baiyi)

### State Supervision of NGOs in Latin America

(pp. 11– 19)

NGOs in Latin America have w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During the process, they managed to transform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from distrust and confrontation to mutual-trust and cooperation. To reinforce the supervision of NGOs, the regional countries have taken a variety of measures in the field of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upport, which aims at maximizing their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restraining their negative effects.

(Yuan Dongzhen)

### Patterns of the State– NGO Relations in Latin America

(pp. 20– 23)

NGOs in Latin America continue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educing poverty, launching anti-hunger and anti-illiteracy programs, and eliminating social ex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y are succeeded in increasing their amount, promoting their credibility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ction. It has been manifested that NGOs are an integral part for the regional countr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condu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attention o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NGOs and the state and evaluating NGOs'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long-term interaction, there exist currently some major patterns of the state– NGO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Cooperation– Complementariness, Supervision– Restriction, and Opposition– Confrontation.

(Fan Lei)

###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Leftist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pp. 24– 30)

Indigenous movements are viewed a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whose rise and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eftist parties. Thanks to the extensiv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conducted by leftist parti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came into being and then attained a sustain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